

闲话

主编 / 臧杰 薛原 青岛出版社



潮起潮落

姚苏凤其人其事

随风逝去的鬼才作家穆时英

庞薰琹：『弄潮者』的潮起潮落

林凤眠、关良、赖少其的艺术回

被精神病的文学青年高长虹

早天的文学青年胡洛

李秉中：文学青年·蓝衣社·军

刘廷芳：神意与诗意

陈简青的道德文章

巴金的幸福幻象

钱锺书邀请钱穆：尴尬与无奈

范泉与冯至的交往

从《新声》到《金刚钻报》的施济群

李伯元、《游戏报》和花榜

喻血轮和他的《绮情楼杂记》

我的父亲顾冷观



闲话

臧杰 薛原·主编 青岛出版社 闲话文丛



潮
起
潮
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起潮落/臧杰, 薛原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6

(闲话文丛; 12)

ISBN 978-7-5436-7109-6

I. 潮… II. ①臧…②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1399号

- | | |
|------|--|
| 书 名 | 闲话(十二)潮起潮落 |
| 主 编 | 臧 杰 薛 原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
| 本社网址 | http:// www.qdpub.com |
| 责任编辑 | 刘 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
| 特约编辑 | 贺中原 |
| 装帧设计 | 申 尧 |
| 平面制作 | 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 |
| 制 版 |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24开(889mm×1194mm) |
| 印 张 | 9.25 |
| 字 数 | 17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7109-6 |
| 定 价 | 25.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80998826

闲话

目 录

起 潮 落 ○

姚苏凤其人其事 / 张 华.....	1
随风逝去的鬼才作家穆时英 / 张功臣.....	19
庞薰琹：“弄潮者”的潮起潮落 / 大 漠.....	55
林风眠、关良、赖少其的艺术问题 / 张 渝.....	79
被精神病的文学青年高长虹 / 房向东.....	89
早夭的文学青年胡洛 / 周允中.....	94
李秉中：文学青年·蓝衣社·军统 / 散 木.....	102
刘廷芳：神意与诗意 / 方韶毅.....	129
陈简青的道德文章 / 李文熏.....	149

闲话

目 录

巴金的幸福幻象 / 孙德喜.....	160
钱锺书邀请钱穆：尴尬与无奈 / 孙玉祥.....	170
范泉与冯至的交往 / 钦 鸿.....	180
从《新声》到《金刚钻报》的施济群 / 蔡登山.....	186
李伯元、《游戏报》和花榜 / 姚一鸣.....	194
喻血轮和他的《绮情楼杂记》 / 眉 睫.....	202
我的父亲顾冷观 / 顾晓悦.....	210



姚苏凤其人其事

张 华

读过一点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电影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新兴电影运动，《春蚕》、《神女》等经典影片就是其中代表作。或许也会了解，促成这场运动的主导力量是夏衍等人组成的左翼影评小组；《晨报》“每日电影”（副刊）是他们开展影评工作的主要阵地。但若翻过这份报纸就会发现，背后另有“推手”。此人正是“每日电影”主编姚苏凤。尽管当代诸多中国电影史著中均无姚苏凤一席之地，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为上海电影圈熟知：苏州人氏，“鸳蝴”派小说后进，“明星”公司的宣传科长、专业编剧。当然，大名鼎鼎的还是《晨报》“每日电影”主编。

吴中“星社”少年

1905年11月，姚苏凤生于苏州。原名赓夔，笔名苏凤。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姚家在苏州也是大族，起初住在桃花坞，有东、西两宅，各有大门进出。这两大宅总共有百多间房屋，据说是明代所建。包天笑的记忆来自他在姚家大宅里读私塾时的情形，那时他的老



师是房东兼亲戚姚和卿先生，也就是姚苏凤的祖父。这位和卿先生与包天笑的师生关系大约维持了两年左右，之后“他便出外作幕去了”，成为姚家至戚、湖南巡抚吴清卿的“朱墨笔（即代批公事）”。而吴清卿的孙子即是民国画家吴湖帆。

姚和卿之子学洲，也以读书

入仕途。据姚苏凤之子姚云先生讲，姚学洲曾当过山东省乐陵县（现乐陵市）的司法官，以后又任县知事。为官清廉正直，离任时无数县民跪拜送行。然而回到苏州后不久就去世了，年龄不过三十多岁。姚学洲的三个儿子中（他共有三子二女），唯长子姚苏凤一直读书、升学，最后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毕业。二子、三子少时皆进钱庄做学徒，稍长又进上海的银行工作，中青年时俱逝。读书或习业（如进钱庄），是当时苏州人的主要择业方式。姚苏凤走上读书之途，主要还是因为他从小就资质聪颖。因而，对于姚家后人，包天笑只在回忆录中写道：“学洲的儿子名赓夔，笔名苏凤，是一位名记者。”从这句话里能看得出，包天笑对姚苏凤的印象仅落在其青年时代的“名记者”形象上。而这一点，又和包天笑不无关系。

由于上述亲谊关系，包天笑对称他为“公公”的姚苏凤在日后成长过程中尽力提携，就在情理之中了。民国初年，姚苏凤还是垂髫小儿，包天笑却已闻名当时报界、小说界。他不仅能写能编，还在编刊过程中慧眼识稿，结识了许多优秀的文学青年，而他本人也被文学界称为“奖掖后进的典范”。后起之秀中，既有后来以通俗小说著称的江红蕉、范烟桥、周瘦鹃，也包括“补白大王”郑逸梅和“名记者”姚苏凤。编辑大东书局的《星期》时（1922年），包天笑曾组织了一个给

○ 姚苏凤于
20世纪30
年代

潮起潮落

姚苏凤其人
其事

他帮忙的写作群体，姚苏凤就是其中之一，以写小品文见长。范烟桥、张毅汉（包提携的另一后进）的作品也时常见于此刊。因此郑逸梅说，“所以苏凤的成名，也是天笑一手提携的”。^①

包天笑的助力使年轻的姚苏凤得以在“苏州小说系”主导下的文坛崭露头角。1923年起，《申报》“自由谈”已不断见到姚苏凤的文字。或杂谈或小说，多在赏花弄月、托物寄情的传统文人趣味中做文章，受“鸳蝴”先辈影响明显。此时，“自由谈”正是周瘦鹃的天地，颇具文人雅集风格；姚苏凤也不只是一个经常投稿的文学爱好者，已拥有“自由谈”记者的名号。当周瘦鹃因编“自由谈”只用“圈内（鸳蝴派）”之稿而多受攻击时，这个“圈内”实际上与“星社”有关。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曾引述刊于《社会新闻》的一篇文章——《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该文是对“自由谈”主编易职之事的评述。文中写着：“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又写到：“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②可见，当时文坛是把周瘦鹃视为“星社”代表的。

有关“星社”沧桑，郑逸梅以老社友的身份记述颇多：

远在一十年代，那时几个喜欢掉弄笔墨的，居住苏州，以文会友，如顾明道、赵眠云、范君博、屠守拙，经常晤叙，我也参加其间。此后，范烟桥自吴江桐花里迁来，在温家岸买到一宅，墙西为顾阿瑛的雅园遗址，因榜之为“邻雅小筑”。……庭院老树参天，杂卉匝地，一泓清水，数叠奇峰，确是个习静吟啸之所。他们也就常在他家盘桓为乐，便由烟桥提议组织一社，即择于那年七夕，为第一次集合，因双星渡河，乃取名星社。^③

最早的“星社”成员，除郑逸梅、范烟桥外，还有赵眠云、顾明道、范君博、孙纪于、范烟桥之弟菊高和姚苏凤。那时，姚苏凤还叫姚

赓夔，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学生，与郑逸梅、范菊高均有同学之谊。入社之举可见两点：其一，姚苏凤对文学喜爱至深；其二，苏州文人群体中源远流长的文化、社会习性对其影响至深。不过，“至深”更在其此后的诸多经历中才能表现出来。

“星社”既成，活动频繁而影响渐及上海。范烟桥有言“苏州去上海近，文人来游览者众，余每为东道主”。^④此后几年间，包天笑、严独鹤、周瘦鹃、丁慕琴、江红蕉、张枕绿、张舍我等也加入了“星社”。赵眠云、范烟桥二位领军人物到上海谋生后，“星社”活动随之由苏转沪。而“上海人文之盛，更胜于苏州，于是参加星社的纷至沓来”。^⑤“星社”影响因此一度遍布上海文坛，周、黎易位事件中可见一斑。长期从通俗小说中获取剧作资源的电影界也早已将“星社”诸子奉为上宾。因此，1933年前后，当电影界热烈讨论所谓新“转变”时，有人说：“在电影界一度流行采用星社小说家编撰的剧本；现在田汉的势力已经替代了星社。”^⑥

关于“星社”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雅集”的聚会方式：“苏州居住条件较好，大都有些斋轩书室，也就轮流在家做东道主，备着香茗，佐以自制的佳点，且饮且啖，又复随意看看书画，以及家藏的文物、大小的报刊，并在文艺上作交换探讨，觉得很有意味，再进一步，规定每月聚餐一次，也是轮值主持。”^⑦这种“文人雅集”的

交往方式根植于某一群体的兴趣背景，又通过频繁的往来强化了原有的地域色彩。“星社”由苏而沪后依然基本保持了这种活动模式，由于社员渐多而集会规模渐大，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于姚苏凤而言，地缘关系实际上成为他日后最为倚重的交往方式之一，



姚苏凤其人 ○
其事

○ 姚苏凤于20
世纪50年代

其往来者多与苏州有关。其次，据郑逸梅记载，当时“星社”同仁几乎每人都编刊物，如范烟桥的《星报》，范菊高的《芳草》，姚苏凤的《诤友》，黄若玄的《癸亥》、尤半狂的《戏剧周



刊》，徐碧波的《波光》和郑逸梅自编的《秋声》，都是刊物中的小型者。^⑧这说明“星社”诸人在习文、从艺之途中，自然承接了前一辈苏州文人如包天笑的做法，以办刊物为己道。当他们相继赴沪谋求新生活时，操办同人刊物的经验很快就转化成谋生的实际能力。因此，“星社”诸子多半在报界谋生而登上上海的大舞台。姚苏凤是其中之一，却也是其中少有的一生都与办刊、编报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个。

还与“星社”相关的是1922年9月在杭州成立的“兰社”。这个文学社团的成员“如施青萍（后改署蛰存）、戴梦鸥（后改署望舒）、马鹃魂、张无诤（即张闻天，笔者注）等，也和星社通着声气，苏杭来往，两地联欢”。^⑨郑逸梅垂垂老矣犹记施蛰存赠《江干集》给“星社”文友。1923年始，戴望舒、施蛰存开始在上海求学并自办刊物《璎珞》，又组文学社团“璎珞社”。几年后，姚苏凤也来到上海谋生、投身银海。不知从何时起，戴、姚不但常常聚于“新雅”粤菜馆（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一度还曾一起住在虹口区的西式弄堂“公园坊”。不过，“新雅”的聚会姚苏凤而言更多地意味着变化：他本人已不只是“星社少年”，而“新雅”诸友除了戴望舒外，还有舒湮、徐讦、叶灵凤、穆时英等。姚苏凤与他们的交往依然不脱文人雅集色彩，不同的是上海新潮的文艺沙龙替代了古雅的苏州园林，这些新朋友也给了他完全不同于“星社”而附丽于上海的新生活感受。

上述种种人、事，与姚家大宅、“邻雅小筑”，“吟风弄月”、“以文会友”，“饮香茗且啖佳点”等等一同构成了姚苏凤的苏州生活。它们

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姚苏凤的生活习性、文学趣味及文艺观念，散漫却执著地影响着姚苏凤不同时期的兴趣与创作，终其一生。

另类影评高手

1927年，姚苏凤不顾家人反对，由亲戚管际安介绍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正式开始了他的银海生涯。

此前，姚苏凤还有几个月的求职经历。他曾托在友联公司任职的徐碧波帮忙，想找个给电影公司编撰字幕的活儿，不在乎月薪多少。徐也是最早进入电影界的苏州文人之一，与包天笑、范烟桥、郑逸梅等谙熟。他劝这个年轻人不必走上此路，原因是当时上海电影界最需要漂亮的女演员，并不缺只会写写文章的男人。姚苏凤却并不失望，依然到处托人设法，同时开始给苏州的《星报》写影评。如愿以偿地进入上海影戏公司后，姚苏凤的职务是宣传兼编辑，月薪四十元——比他丢弃的旧业少了一半。尽管如此，姚苏凤还是很有热情地做着各项日常工作，发消息给各报，报告新片的摄制情形等等。此外，写新片本事、做字幕、编特刊，也都是他的分内之事。

然而工作热情终究无法应对入（四十元）不敷出（一百元）的窘迫。恰逢张慧冲创办“慧冲影片公司”，特地请他去帮忙。姚苏凤就多了一份兼职的宣传工作。1928年前后，张慧冲自编自导的《水上英雄》卖座很好，其中不无姚苏凤的文字功劳。此后，“我就暂时离开了电影界。管际安先生又介绍我到民国日报去当编辑。”^⑩

再回电影公司任职已是1929年。这一次，姚苏凤进了天一影片公司，先编撰字幕，后改任编剧。对这段经历，他记得很清楚：

突然地一天，有一个不甚相识的朋友过访。

他是李一鹤先生，在寒暄以后，他开始说明了来意。原来天一影片公司雇用一個编写剧本和字幕的人，而邵醉翁先生属意于我，特地由他来做

潮起潮落

姚苏凤其人
其事

○ 电影《青春线》剧照

闲话文丛 ▶▶

○ 1933年4月13日
《每日电影》

介绍的。^①

至1932年，姚苏凤先后为“天一”写了《夫妻之间》、《歌场春色》、《芸兰姑娘》（与人合作）等几部剧作。直到着手主编“每日电影”之际，才不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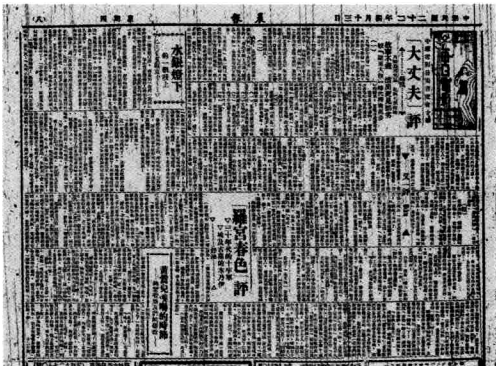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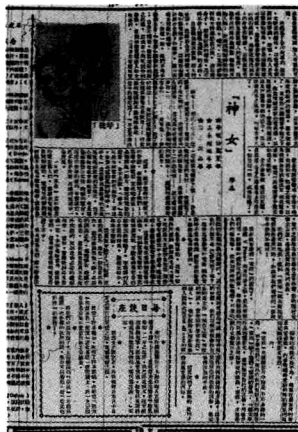
歉意地向邵醉翁递了辞呈。就在供职“天一”的第二年，姚苏凤又由周剑云介绍，兼任明星公司的宣传科长，之后改任专业编剧。1933年到1934年间，他不仅为明星公司写了《妇道》、《路柳墙花》、《青春线》、《夜会》等电影剧本，还亲自导演了《青春线》，尽管票房不甚成功。

两涉银海、几度易职；从宣传员到编剧再到导演，姚苏凤一步步熟悉了电影场里各个环节的工作，称其为影坛多面手并不过分。不过，这些并非他银海生活的全部；还有一份让他颇为看重的差事，那就是写影评。成为“每日电影”主编后，尤其如此。事实上，在电影圈里抄抄写写是大多数苏州赴沪文人的谋生之道。有包天笑、周瘦鹃等领军人物在先，姚苏凤难出其右。真正让他不同于诸位“鸳蝴”前辈的恰是“影评人”

的身份和工作。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

……由于朋友们的翊助，使这一刊物成为今日中国电影刊物的锐利的战士。在这时





候,我对于电影,总算有了更多的认识了;在朋友们的引导与教诲中,我总算获得了许多新的教训而使我自己开始走上了新的前路。

我将努力,我决心为电影事业作真诚的服务。……^⑫

文中所说刊物正是“每日电影”,“朋友们”则是左翼文艺界的夏衍、郑伯奇、阿英、王尘无、陈鲤庭、鲁思等

人。在他们的“引导与教诲”中,姚苏凤的电影观乃至文艺观的确一度发生巨变,“走上了新的前路”。然而,当姚苏凤意识到“新路”不似想象中那般坦荡、开阔时,他放慢脚步开始思考,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方向。所有这些,都是他为中国电影事业所做的真诚服务,也一一体现在他的影评文字中。

自1932年7月创刊到1936年1月收场,“每日电影”刊出署名“苏凤”(包括与他人联合署名)的影评近180篇。其中有个明显可见的变化过程:从“公论”(或曰“集体的声音”)渐次蜕变为“私见”,最终竟至“偏见”。所谓“公论”,简单说就是统一按照当时流行的左翼文艺批评模式写影评。不论什么影片,一律依照两个标准来评判:意识是否先进、结尾是否指明出路。“每日电影”早期的影评(尤其是集议之作)大多套用这种模式,也因此很快树立起一种思想“进步”形象。写惯了电影剧本和小品文的姚苏凤起初很不会写这种批评文章,就像穿惯了长衫的人不适应西装。事实上,这种为革命热情所裹挟的批评观既不合情理也有悖剧作的真实性要求,但在“咸与进步”的嘈嘈切切中,冷静的思考暂时被搁置了。于是,联华公司的《人道》(1932年7月)上映后,姚苏凤先和其他人合写了一份凌厉的批评,之后又针对剧作另著长文。行文结束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 1934年12月9日《神女》

潮起潮落

姚苏凤其人 ○
其事

不过，我又自己笑了，我这种意见，对于《人道》的故事本身的思想又有些什么好处呢？我还是跳不出封建思想的圈子！至多，我还是想博取一些资产知识阶级的虚伪的同情而已！^⑬

姚苏凤在自嘲，认为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影评人意识，还没有学会从“思想”是否先进来看电影的好坏。而几人合写的对《人道》的“公论”是：“这本影片，充溢着封建主义思想，是反物质文明的，是反都会的，是开倒车。”^⑭

一种意识既已滋生，就会不断成长。每天看影评、写影评的姚苏凤很快掌握了左翼影评话语，成为善写“公论”的影评人。比如他对《啼笑因缘》第二集的评论是：“原作意识太坏、编剧手法不佳、导演尚无太过、演员均甚努力”；认为《黄粱一梦》故事不通、对白冗长、意识甚恶劣，是“古典诗人之梦呓”。这一时期影评的通病显而易见：言必谈意识，且多用否定性标题。充分体现了左翼影评借助“民族”与“革命”叙事废“旧”立“新”的生成机制及其爆发式的影响力。然而，只要稍微脱离民族和道德话语构成的特殊情境，“影评人”的“自我”就会悄然浮现于字里行间。姚苏凤对美国电影《大饭店》的评论正是如此。

在姚苏凤眼中，《大饭店》的剧作很“聪明”，虽然他又说“这个故事本身是太感伤了，太不积极了”。然而下面一句话却点明最打动姚苏凤的恰是这种感伤意味：“这是一首感伤的写实的诗，对于感受到人生的苦闷而又没有出路的‘中间份（分）子’是多么配胃口啊！”^⑮这种“感伤”是一种易于引起共鸣的人生感怀，也是姚苏凤这类知识分子对此片心怀戚戚的主要原因。然而，有悖于左翼的“积极”与“乐观”。以如此抒情的笔调写影评，显然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夫子自道，可见姚苏凤对“中间分子”的苦闷已深有体认，虽然他已被当时影评界视为“先进”的影评人。这样说或许更准确：姚苏凤在左翼倡导的革命标准之下否定了这部资产阶级影片；在情性的天平上，

《大饭店》无疑深得他心。“公论”中的一丝个性裂纹由此可见。

1933年9月，姚苏凤提笔为美国电影《乱世春秋》叫好。他称这部影片“伟大”，并且认为“这影片是太配合小市民的胃口了，‘史迹的追维，身边杂事的感伤，恋爱，死亡’……这一切的一切”。^⑩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切的一切”还是“感伤”。而黄子布（夏衍）却用醒目的反问标题明确表达了他对《乱世春秋》的不满：“反战乎？备战乎？”

“艺术乎？工具乎？”“演剧乎？电影乎？”其实姚苏凤很清楚《乱世春秋》在左翼批评标准下不是好片，所以给文章加了个副标题“但不是中国人所喜欢的”。无论怎样，通过矛盾的正副标题，姚苏凤再次流露了真实的个人审美趣味，也就是一种“私见”。这个词正式提出则到了姚苏凤“三评”《暴雨梨花》（马徐维邦，1934年5月）时。姚很欣赏该片的编剧技巧及“感伤”意味。针对某些影评人无端让影片男女主人公成为革命战士的设想，姚苏凤称之为“某一种公式下的机械论”。针对其他影评人对该片“浪漫主义”以至“感伤主义”的批评，他重申“私见”：“对于《暴雨梨花》之类的作品，我们固可以说‘不当强调在感伤这一方面’，却不能说‘感伤是要不得的’而忘记了这里的现实性。”^⑪简单说来，姚苏凤反对的是一体抹煞，是机械地“这样”或“那样”；所坚持者，是保留多样性，是结合实际区别看待。这恰与左翼强调的非左即右批评原则背道而驰。

身处影评统一战线而大谈“私见”并非易事。不过，左翼影评理论与姚苏凤已有的电影观念、实践经验日渐矛盾，他还是在此后一系列影评中坚持不要模式化，甚至明确说出“苏联电影不一定都好，正如美国电影不一定都坏”。由此而来的后果出人意料。1934年12月，姚苏凤编导的《青春线》上映。除“每日电影”同人舒湮为此片写了长评外，其他各报影刊一致沉默。姚苏凤编剧的其他影片从未遭此冷遇。恰在此前不久，左翼诸公借“软硬之争”纷纷撤离“每日电影”。姚苏凤就此成为“影评人”统一战线之外的影评人。

因此，他索性声称：“批评，我不写了！”^⑮事实上，他倒没有从此掷笔，只是写作数量一时锐减。一段时间的沉默并不表明姚苏凤对影评本身失去兴趣，而是以此表示对左翼影评所代表的“集体声音”的抗拒。不妨说，说完这句话后，姚苏凤彻底告别“公论”，把“私见”以“偏见”之名明确化了。他把自己对“公论”与“偏见”的看法以“偏见集”为名在《小晨报》（姚苏凤主编）合盘托出：



不知是什么人分出来的类别，居然把“公论”推为真理而把“偏见”贬为恶德。这样一来，聪明人们说话不能不装得公正一点，而“偏见”之为“正人君子们”所讳言，真是由来已久了。然而，在我，却总以为“公论”未必真“公”的时候，“偏见”却至少还有着比公论更可爱的所在：倔强、勇敢、坦白、不阿私、不盲从……这全是偏见存在的支点，而《偏见集》之作，尽管无所逃于“正人君子们”之诛责，我却依然觉得“有恃无恐了”。^⑯

由此可见姚苏凤对“自己”的进一步坚持。他也曾说过：“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都有‘自己’，好像有许多人便是为人家而存在的……因此，我仍旧赞颂一切的‘偏见’。即一切习惯用的好听的名辞，然而这类好听的便不知有多少人在赞颂着‘公论’以及其他名辞事实上永远只是像一个泡沫在大海里。”^⑰

当他连“影评人”身份也敬而远之时，“私见”才真正成为“偏见”。1934年末，姚苏凤在《〈重婚〉随感》中明确写道：

当电影批评之“阀”把影评视为“对于友人之赠品和对于敌人之冷箭”，甚至把影评视为变相的广告的时候，我已以决心逃出这常常在“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之下遭遇到假意的敷衍与背后的轻视的所谓“影评人”之阵营……我不再愿意被视为“影评人”。……^⑱

对于《重婚》，他说：“就让我说一些‘一个观众’的意见吧。”既然如此，那就可以随意写自己的“偏见”了。自此后，姚苏凤在“偏见集”中对《亚兰人》（Men of Aran）的摄影技术称赞有加，也在“观影日记”中批评《人之初》“硬加一条义勇军的尾巴”。以“日记”这种最“私”化的文体为“影评”命名，可见他对“公论”已拒之千里。不过，日记体的确使姚苏凤的影评最大程度地达到了一种自由写作状态；他的“偏见”亦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评的别样风貌。



中间派编报行家

除却对电影的热爱，姚苏凤的善写和高产与他编辑刊物有密切关系。若非主编《每日电影》，不会写下数百影评。但作为主编，姚苏凤其实另有过人之处。这又与他持续不断地做报刊工作有关。实际上，姚苏凤长期穿行于影场与影刊之间，他的职业生涯也由影场和刊物两条线索交叠而成，20世纪30年代尤其如此。

潮起潮落 C

“星社”时期的自编刊物尚属娱己悦人，姚苏凤第一份正式的报界工作是前文所说在《民国日报》当编辑。初进《民国日报》，姚苏凤曾是“觉悟”副刊编辑，不久又开始编“闲话”。1928年1月始，《民国日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八种副刊，其中包括“电影周刊”，也由姚苏凤主编。这个副刊主要刊发中外电影动态、影片时评，自1928年2月5日发刊至1929年1月27日终刊，共办了50期。从内容来看，姚苏凤广开言路的编辑思路已初步形成（比如多请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学员写稿），其中也不乏自己的主张。就版式而言，“电影周刊”始终保持着总体整齐划一、细部清新精致的版面风格，50期不变。与此后姚苏凤相继主编的《晨报》、《小晨报》相比而言，“电影周刊”已显示出日后为人称道的“姚式编排”的基本风格：“版面上辟栏，长条，加花边，转行等等”；^②只是内容集中于电影场内外，不似《小晨报》那样

姚苏凤其人 ○
其事